从北大红楼走出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及

对当代思政宣讲的启示

摘要：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于1919年3月，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宗旨，通过露天讲演、工厂与农村实践等形式，打破思想启蒙的精英壁垒，推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传播。讲演团聚焦北平工农阶级，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劳苦大众、培养革命骨干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对新时代思政宣讲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平民教育讲演团 宣讲 大思政课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北大红楼，是无数新思想、新主义、新尝试的汇集地，这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早期革命活动，孕育了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一大批从事学术研究或具有政治倾向的社团。这座承载新文化运动火种、掀起五四运动浪潮、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对近代中国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9年3月，邓中夏、黄日葵等人在此地酝酿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成立的初衷是打破思想启蒙的精英壁垒，让教育走入平民当中，补充学校教育不足。它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逐步演化为党的外围组织,许多成员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时光荏苒，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宣教工作依然面临着“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时代课题。我们的主流媒体矩阵日益壮大，数字化传播手段不断迭代，但思想的传递并没有变得更加容易。回首百年前，讲演团在受众文化水平、传播方式渠道都受时代客观限制的条件下，进行了哪些尝试？ 推动“平民教育”的目的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讲演团的兴起和衰败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又昭示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1. 从圣谕宣讲到平民教育

宣讲是中国传统的大众传播形式之一。“宣”的本意是帝王的宫殿。《说文解字》中提到：“天子宣室也。”后来引申为“大”“广”之意。“宣讲”指的就是对大众进行大而广的讲演。

1. **封建时期的宣讲活动**

封建时期的宣讲，内容主要为帝王圣谕、儒家经典、宗教义理等。宋明理学中朱熹、王阳明等理学家通过书院讲学传播思想。明代设立“申明亭”，由里中“老人”定期向百姓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教民榜》等。清代延续明代制度，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后又颁布了诠释十六条的《圣谕广训》，并下旨要求每月朔望宣讲两次。“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从而将宣讲“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确立了下来。[[1]](#footnote-0)

清朝末年，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一部分知识分子希望“用中心文化中最具权威、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作为武器，来抵抗外族入侵，消除内部动乱……”即利用圣谕宣讲来指导民众的生活，并催生出“圣谕宣讲小说”这一类型。这种宣讲形式，在四川和岭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

**（二）苏俄演讲方式对中国的历史影响**

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伴随着苏俄的革命实践，通过共产国际传入中国。当此之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王朝灭亡，民国建立，但宪政不彰、军阀割据、外侮纷至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都在通过穷举式实验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法，学习模仿苏俄的革命实践正是恒河沙数的救亡尝试之一，而其中的革命宣传深刻改变了传统宣讲形式中的封建底色。1919年2月，李大钊撰文《青年与农村》指出：“他们（俄国）有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有时乘着他们休息的时间和他们谈话，有时和他们在一处工作，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们同情的伴侣。有时在农村里聚集老幼妇孺，和他们灯前话语，说出他们的苦痛，增进他们的知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2]](#footnote-1)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报告》中也提到，“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拯救中国人民，就必须注意劳苦大众的生活；……许多学生放弃了个人利益，离开学校，开始进工厂、下农村，处处传播社会革命的思想。” [[3]](#footnote-2)

**（三）从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北京进步知识界的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出了“劳工神圣”“到民众中去”的呼声。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天安门讲演大会上提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作平民大学。”[[4]](#footnote-3)他认为，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学校授课不同，平民教育可以通过公开、广泛的演讲来实现。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则更加直接地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5]](#footnote-4)

当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在孕育，很多后来的骨干成员已经在不断尝试学习、复制苏俄革命实践中的一些方法。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发起创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将工人纳入了宣讲对象之中。与当时国内工业相对发达的上海等城市相比，北京的工人群体并不庞大，这种目标群体的选择显然受到苏俄革命实践的影响。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自1919年创建，一直活动到1925年，为后期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补习学校等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探索之路
2. **“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

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近发起组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6]](#footnote-5)邓康即邓中夏，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消息后面还刊登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后简称《征集团员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后简称《简章》），《征集团员启》中登录的14位发起人，多为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和新潮杂志社成员，他们呼吁“同学中热心平民教育者，愿兴起共襄斯举”。《简章》中注明讲演团的宗旨为“增进平民智识、换起平民之自觉心”，讲演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形式，定期讲演“每月四次，于每星期日下午一时至四时举行之”。不定期讲演“如有事件发生，或春假、暑假及国庆日，经本团团员认为必须讲演时，临时酌定。”在他们的宣传下，截止3月22日，有30余人加入讲演团当中。其中，邓中夏、廖书仓被选为总干事，康白情、罗家伦为编辑干事。

在平民讲演团成立的6年多时间里，共有100多名北大学生加入其中。讲演活动弥补学校教育不足，达到平民教育普及的诉求，不啻为知识分子们开始拉近与劳苦大众的距离，走工农结合道路的一次有益尝试。

1. **“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

1919年4月3日到5日，讲演团开展第一次宣讲活动。地点位于东便门内蟠桃宫。在1919年4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后简称《纪事》）中，记录了邓中夏、廖书仓等25人宣讲的38个主题。其中廖书仓、丁肇青各讲了3场，是宣讲场次最多的两位。演讲主题有廖书仓的《平民教育讲演之意义》、许德珩的《勤劳与知识》、周长宪的《赌博之害》、邓中夏的《家庭制度》等，涉及领域极为丰富广泛。讲演团初战告捷。《纪事》中提到：“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预料之外”。

讲演团所选的时间，正值蟠桃宫庙会，这是当时北平地区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有“三月里来三月三，蟠桃宫外好人烟”之称，位于东便门内的蟠桃宫集市规模庞大，涵盖商贸、娱乐、民俗表演等，每年吸引大量人员参与，为讲演团提供了绝佳的活动场所。参加庙会的人多为普通市民、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契合讲演团的目标群体。“露天讲演”的方式打破了传统课堂的封闭性，使新文化运动从校园走向市井，这次讲演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也让讲演团的成员有了更大的信心。

4月27日，13位讲演团成员前往护国寺进行讲演。之后，为扩大宣传，又在城内东西南北各设一个固定的讲演点，分别是位于珠市口的京师公立第一讲演所、位于东安门外的京师公立第四讲演所、位于西单的京师公立第五讲演所、位于地安门外的京师公立第十讲演所。五四运动期间，四处固定讲演点共开展了4次宣讲活动，竭力宣传五四爱国运动，并以邓中夏的《青岛交涉失败史》、廖书仓的《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周炳琳的《山东与全国之关系》、潘宗翰的《五月四日》等讲演，揭露了帝国主义通过秘密外交与强盗逻辑瓜分中国的野心，将民众的愤怒引向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知，促使更多青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之中。1921年9月，讲演团对成立两年来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称创办不久，颇著成效，“轰动一时之‘五四’、‘六三’运动，本团团员曾尽力奔走呼号，竭力宣传，颇有以促醒社会之自觉，而引起同情。”[[7]](#footnote-6)

1. **“广邀团员，以为大扩充之地步”**

1919年10月12日上午，讲演团召开第二次全团大会。此次会议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原团体被划分为4个固定小组，每组设书记两人，按周轮值管理日常事务。四组轮流在4个讲演点开展活动。之后，讲演团不断扩大队伍、扩大活动范围、增加演讲内容。自1920年起，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深入北京附近的农村和工厂，由城内定时定点的讲演转向更为广阔的周边地区。在1920年3月14日的第三次常会上，决定“广邀团员，以为大扩充之地步”“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号召团员们在春假或者暑假回家的时候，就地开展演讲活动，并组织讲演团体，宣传平民教育的思想。在3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启事中，强调这次的讲演活动不限地点，也不受分组的限制，“非团员亦可加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3月27日晚，干事会议上议决将此次讲演的日期定为春假期中的4月2日、4日、6日、8日4天；讲演地点定在卢沟桥、丰台、长辛店、海淀、罗道庄等处。这次外出讲演活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其中，在长辛店地区，“工厂下班的工人经过这里，有些站下来听。有些最热心的听众就一直站着听到末了。”[[8]](#footnote-7)讲演团在丰台讲演了3场，在通县讲演了6场，覆盖听众800余人。

1. **“听者对之犹如耳边风一吹而过”**

随着平民教育讲演团规模逐步扩大，讲演团的演讲方式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出现了问答式讲演，加强讲者与听者之间的互动。1923年12月，讲演团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之际，进行了一场以中国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民意测量”，随机抽取民众进行采访。测验包含10个问题，涉及政治、外交、社会等多个方面。测验结果显示，民众对北洋政府和国会普遍不满，对社会主义和学生运动则较为支持。这次民意测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在民众中的传播情况，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与此同时，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了出来。一方面，讲演团的讲演内容主要是关于国际、国内的时事，与平民百姓的关系不大。因此普通人只是听个热闹，不往心里去。还有一些讲演内容虽与常识有关，但因缺乏基层组织的动员和普及，未能对民众的生活习俗产生持续的实质影响，如某次讲演团到乡村去演讲，讲到《女子缠足之害》时，“那些躲在门里面的姑娘，都羞羞答答地关上大门跑开了。”[[9]](#footnote-8)演讲的效果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讲演团的成员前后加起来也不过百余人，讲演活动听众与北京地区的工农群众数量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能取得的影响极为有限。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朱务善回忆，“这项工作虽有一些成绩，但因为听众较少，收效不大，特别是在郊区农村或北京附近各车站。……听者对之犹如耳边风一吹而过。”[[10]](#footnote-9)

1925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发布了最后一个讲演启事，年底结束了活动。

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就与不足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实践载体，以露天宣讲、农村工厂实践等形式普及反帝反封建思想，培养了邓中夏等早期革命骨干，为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基础。但其活动对底层民众思想启蒙的深度与持续性不足，后期组织松散未能形成有效社会动员，折射出一定的时代局限。

**（一）在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光芒闪耀**

**1.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产生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是初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之一**

平民讲演团的主要成员，如邓中夏、黄日葵等人，都是李大钊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也是早期共产党小组的成员，黄日葵著文提到“五四运动以后，北大的学生——国民杂志社的分子也有牺牲学业，跑到有工厂矿山的地方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了，北大的学生也像俄国的前辈一样，历险者有之，坐牢狱者有之了”[[11]](#footnote-10)。这里提到的国民杂志社成员与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会员多有重叠。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以演讲团为手段，向工人、农民宣讲救国救民的道理，讲解马克思主义原理，高呼反帝反封口号，试图以这种方式启发民众，唤醒民众的热情，并甘愿冒着面临牢狱之灾的危险坚持斗争。他们的努力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为中国革命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被视为“北京共产党的外围机关”，他们的实践活动，宣告着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底层民众，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中国实际当中。

**2.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最早表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意愿**

1921年初，已经成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辛店建立的劳动补习学校，就是以讲演团的名义对工人展开活动，教员也多为讲演团成员。[[12]](#footnote-11)讲演团将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想转化为工农群众熟悉的语言和形式，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建立了联系，为后来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探索了宝贵经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同时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骨干的重要阵地，许多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工人后来成了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讲演团的这些活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昭示了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用群众能听懂的语言传播思想，才能真正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革命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力量的道理。

**3.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为中国革命锻造了一批兼具理论素养与群众工作能力的革命骨干**

讲演团开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实践范式，也教育和引导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邓中夏从学生领袖迅速脱变为工人运动先驱，创办[长辛店](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8%BE%9B%E5%BA%9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_blank)劳动补习学校，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4%B8%83%E5%A4%A7%E7%BD%A2%E5%B7%A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_blank)，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13]](#footnote-12)；黄日葵受党组织委派开展青年运动，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后参加南昌起义，辗转香港、上海、日本等地开展革命斗争并几度入狱，因积劳成疾在上海去世；许德珩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创建九三学社，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值得一提的是，萧超然在《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中，提到“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还加入了由邓中夏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4]](#footnote-13)，但并未提到他是否参加了具体的讲演活动。梳理时间线后可以看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时期与毛泽东两次来京时间有少量重叠。毛泽东与邓中夏常有书信往来，在京期间亦交流密切[[15]](#footnote-14)。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多重困境中举步维艰**

**1.精英主导、自上而下的运动形式难以长期维持**

从一开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就是一场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运动。北京地区近代产业工人群体规模远小于上海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根据资料记载，1929年，上海工人共有28万余人，北京工人总数仅7000余人[[16]](#footnote-15)。五四时期北京工人阶级的实际数量稀少且分布零散，主要集中在少数铁路、矿山等企业（如长辛店机厂、门头沟矿山等）。平民教育讲演团将大量资源投入工人宣讲，本质上是对苏俄“工人中心论”的机械模仿，理论与本土实践出现了脱节。讲演团的活动高度依赖北大师生，未能有效发动工农群众参与其中，听众置于被动接受地位，无法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传达出来，宣讲团的活动难以产生持续的影响。

**2.“工学界限”带来的隔阂难以消除**

宣讲对象为工人、农民。但工农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始终没有得到调和。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提到，“当时党组织曾认真加以分析过，认为工学界限来自两方面：一是工人本身疑虑所产生的，这是认识问题；其次是来自工人以外的政客官僚对工人与学生挑拨离间造成的。”[[17]](#footnote-16)一方面工人过着清贫艰苦的生活，“劳动者长期在自然灾害与人造灾难交替中过生活，都在饮泣吞声地吃着杂粮饼子”，他们视学生为“金枝玉叶”，是未来的统治阶级，因此不愿意与学生结交，以免引来祸事。另一方面政客官僚们害怕学生与工人交往密切，会导致罢工事件频出，于是不断向工人进行恐吓，将学生们描述为煽动工潮的危险人物，工人与学生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3.核心理念脱离社会实际，悬浮于社会现实之上**

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行动在近代中国难以成功，其根本症结在于这种教育理想与当时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抗关系。从社会背景来看，民国初年处于封建制度崩溃后的转型期，地方军阀割据，政治权力高度碎片化，教育政策缺乏统一实施的社会基础，任何试图通过文化启蒙实现社会变革的路径都必然遭遇现实困境。经济上，北京及周边地区以农村自然经济为主导，农民在生存压力之下，无力承担最基本的教育投入，平民教育缺乏可持续的物质支撑。思想方面，进行宣讲的知识分子未能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工农群众可理解、可操作的斗争策略，讲演内容停留在“破除迷信”“妇女解放”等表层议题上，无法解决农民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生存危机。

四、对新时代思政宣讲的启示

在帝国主义经济掠夺与封建土地制度的双重压迫下，缺乏经济基础支撑的教育平等理想注定难以落地。五四时期的种种社团尝试最终都走向了湮灭。它如大浪淘沙，一些人沉寂了下去，就此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但是还有一些人脱颖而出，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在血与火的革命实践中开辟出一条民族复兴之路。面对当今时代思想领域多元思潮激荡的环境，开展新时代思政宣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社团的尝试为我们指明了教训、也带来了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宣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全球化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借助网络加速传播，亟需通过系统化宣讲筑牢主流意识形态根基。

**（一）高举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回顾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历史，它的消亡印证了仅有“教育普及平等”等理想化、笼统化诉求，但缺乏明确路线指引、脱离最广大人民实际需要的思想运动必然难以持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本质上是要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开辟了正确道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关键。以讲演团的历史为镜鉴，既要坚持理论宣讲的人民性，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更要强化理论武装的系统性，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2023年，西城区组织“马院进社区”活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先后走进西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通过小切口反映大主题，深入浅出地宣传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解读、分众化传播。

**（二）****锚定关键：坚定思政宣讲的重要地位**

随着当代中国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宣讲必须突破传统模式，构建“大宣讲”格局，多方面、多维度组织开展。思政宣讲只有扎根现实土壤、善用创新手段，才能在多元激荡的思想浪潮中掌握主动权，激发青少年的使命担当，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注入澎湃能量。

近年来，西城区深耕党史宣教领域。充分利用天桥地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宝贵的曲艺人才资源，打造“党史文艺宣传队”，采用快板、评书、数来宝等形式开展党史文艺宣传；深入挖掘红色教育资源，从转换主语、展示形式上进行突破，开展“红领巾讲红故事”活动，使被动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变成主动参与者；以开展主题教育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系统梳理红色基因的深层内涵，打造“史志青年宣讲团”，以鲜明的地域党史特色引发思想共鸣。这些活动坚持红色文化引领、品牌特色带动，让党在历史上的光辉经验、优良传统和作风深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内心，引导大家从红色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营养，从历史启迪中把握前进方向。

**（三）立足实际：在群众身边讲好思政故事**

思政宣讲走群众路线，就是要把群众的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从身边的人和事出发，让思政宣讲真正深入人心。一方面，内容要“去距离化”，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日常语言，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关切的问题、实践的场景推动理论传播走深走实，让思想理论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现实力量；另一方面，形式要“增鲜活性”，在信息传播多元化的今天，群众的信息接收习惯呈现碎片化、可视化、互动化特征。思政宣讲需主动适应这一趋势，立足群众生活实践，让理论宣讲真正融入日常生活。西城区将红色历史、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形式深度融合，形成“舞台主课堂+多元延伸场景”的立体化宣讲矩阵。2025年6月，全国首部以邵飘萍为原型的原创话剧《京报》在西城区上演，并结合演出剧目推出沉浸式体验活动，使“舞台上的思政课”进一步扩展为“场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网络上的思政课”。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四）全域覆盖：构建全民全域宣讲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要善用社会大课堂。西城区以“十进”为抓手，推动党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进社区、进网络、进交通枢纽、进景区、进小哥驿站、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实现“人人争当宣讲员、处处皆是宣讲地”。

一方面，要构建全民参与的宣讲生态。引导青少年、党员志愿者、快递小哥等群体以“身边人”身份讲述实践故事，消除理论宣讲的疏离感，激发群众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一方面，不同场景承载的受众需求不同。如机关单位需强化政治引领，校园应注重价值启蒙，企业侧重实践转化，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所提供的传播形式也要有所不同。2025年8月，西城区依托“红墙下的红领巾成长营”在北京李大钊故居开展“星火明居·少年志言”小小讲解员活动。由少年宣讲团成员带领辖区青少年、少先队员开展实景讲解、分组演练、诗剧展演等活动，沉浸式学习李大钊革命精神，深植家国情怀。全民全域宣讲格局的构建，标志着思政宣讲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这一实践不仅拓展了理论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更重塑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形态，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坚实支撑。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社团，它更是一座桥梁、一颗火种，展现着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尝试与“教育平等”的理想。作为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结合的早期探索，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行动是对旧社会观念的有力冲击，也为后续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在信息高度发达但也日益碎片化的今天，宣讲活动更应承担起传播真理、沟通社会、启迪民智的使命。在思政宣讲中，尤其应当继承这份“到民间去”的传统，以贴近现实、扎根大地的宣讲方式，打造社会共识，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文明发展注入了强大且持久的动能。

西城区委党史办 李璇 83975339

1. 周宝东：《<宣讲博闻录>：圣谕宣讲小说的集大成者》，《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4期，第145页。 [↑](#footnote-ref-0)
2.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footnote-ref-1)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194页 [↑](#footnote-ref-2)
4.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footnote-ref-3)
5.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footnote-ref-4)
6. 谢荫明、陈静等:《北京的社团》（第一辑），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footnote-ref-5)
7. 王建伟：《走上街头：1920年代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高福美主编：《北京史学论丛（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章“社会生活”第1篇 [↑](#footnote-ref-6)
8. 谢荫明、陈静等:《北京的社团》（第一辑），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footnote-ref-7)
9. 谢荫明、陈静等：《北京的社团》（第一辑），知识出版社，第76页。 [↑](#footnote-ref-8)
10. 同上。 [↑](#footnote-ref-9)
11.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1923年12月17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5、36页。 [↑](#footnote-ref-10)
12. 冯姿荣、何培香编著的 《邓中夏年谱》中还提到“（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办校经费由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募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 [↑](#footnote-ref-11)
13.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footnote-ref-12)
14.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footnote-ref-13)
15. 冯姿荣、何培香编著: 《邓中夏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据《马非百自传》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期间，就三天五天地不断到曦园来，主要是和邓康、罗章龙接头最多，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天。’” [↑](#footnote-ref-14)
16. 龚俊：《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93页 [↑](#footnote-ref-15)
17. 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8页 [↑](#footnote-ref-16)